

规律。严羽《沧浪诗话》中也说“诗有别材”，分明就是“别有一家”的另一说法。由此可证诗与词的不同，早已为这两不同的文学样式特有的规律所决定。可是，长期以来的作者和赏析者都有一种“心知其意，口不能言”的感觉，尽管是“有别材”也好；“别有一家”也好，到底还是没有讲出来，说清楚。无怪青年人都会提出这样一个带有同感的问题。本文就是试图从这方面作一粗略的解答。最早的词，原本是能入乐的诗，主要是五、七言绝句，如李白的《清平调》，清沈德潜《唐诗别裁》中列为“七言绝句”，而温庭筠收入《花间集》，万树收入《词律》。《忆秦娥》分明是首五绝，而顾梧芳（？）选入词集《尊前集》中。他如韦应物的《三台》，刘禹锡、白居易的《杨柳枝》、《竹枝》、《浪淘沙》等词，根本与七绝无异，更足以窥见诗是词之源，词是诗之余的痕迹。在词的发展过程中，为了入乐的缘故，往往添加了句子的衬音，从而逐渐破坏了原来整齐的句式而变得句有长短了。同时一到音乐与文学分道扬镳以后，经过历代词家的度腔谱调，各出机杼，因而演变成为各种各样的词调，与诗的差别愈来愈大。所以从句法或格律上来考察，有许多是“诗中所必无”而却是“词中所必有”了。这才使原来同根生长的东西，产生迥不相同的面貌。使人想起一首曾被苏轼认为恶诗的唐徐凝《庐山瀑布》诗，中有“今古长如白练飞，一条界破青山色”之句，就诗论诗实在并不坏，正可以借以形象地说明诗词本是同源，犹如原来相连的山岳，横被一条白练分割为二而已。对于这个道理，自知功力与水平尚属肤浅，未能道尽此中三昧。朱晦庵《和陆子寿》诗云：“旧学商量加邃密”。只有不断地切磋“商量”，对于这一问题的认识，才会更加“邃密”起来。

1981年1月写于半毡室

此文脱稿以后，匆匆交给学报编辑部，未及细致检阅，总感到有个什么问题还没有讲透似的。四月上旬友人冯其庸君来沪，陪他驱车去同济新村，路上谈起此文。他说词还有一点有别于诗，即上海口语之所谓“嗲”是也。这才使我想起所脱漏的是“境界”的问题。晏殊《浣溪沙》“无可奈何花落去，似曾相识燕归来”两句名噪一时，但后来又放到《示张寺丞王校勘》诗中，就未必见得出色。《儒林外史》中提到“桃花何故红如许”一句，实是劣诗，但改就“问桃花何故红如许？”便成好词。可知诗与词的差别除语言结构之外，还有一个境界的问题。一个通俗的“嗲”字，却深中青紫。为此附记一笔，对自己治学的粗疏，谨向读者致歉，并准备另撰专文以探讨之。

1981.4.27. 江辛眉记于上海师院

## 孔子谈性格类型

·野草·

瑞士心理学家、苏黎世学派领导人荣格（Ane Jmng, 1875—1961）把性格划分为三种类型：外倾型，倾向于外部世界，对人对物均感兴趣，这是些活泼、开朗、特别善于交际的人；内倾型，倾向于内部世界，只对自己才感兴趣，这是些冷淡、孤僻、不喜交游的人；大多数人属中间型。

其实，关于性格的类型，早在两千多年前的孔子就是这么划分的了。他说：

不得中行而与之，必也狂狷乎！狂者进取，狷者有所不为也。（《论语·子路》）

意思是说，假如找不到中行的人做朋友，那就一定会交上狂者和狷者。狂者富有进取精神，而狷者（拘谨的人）则什么也不想干。很明显，这里的狂者相当于外倾型，狷者相当于内倾型，中行相当于中间型。